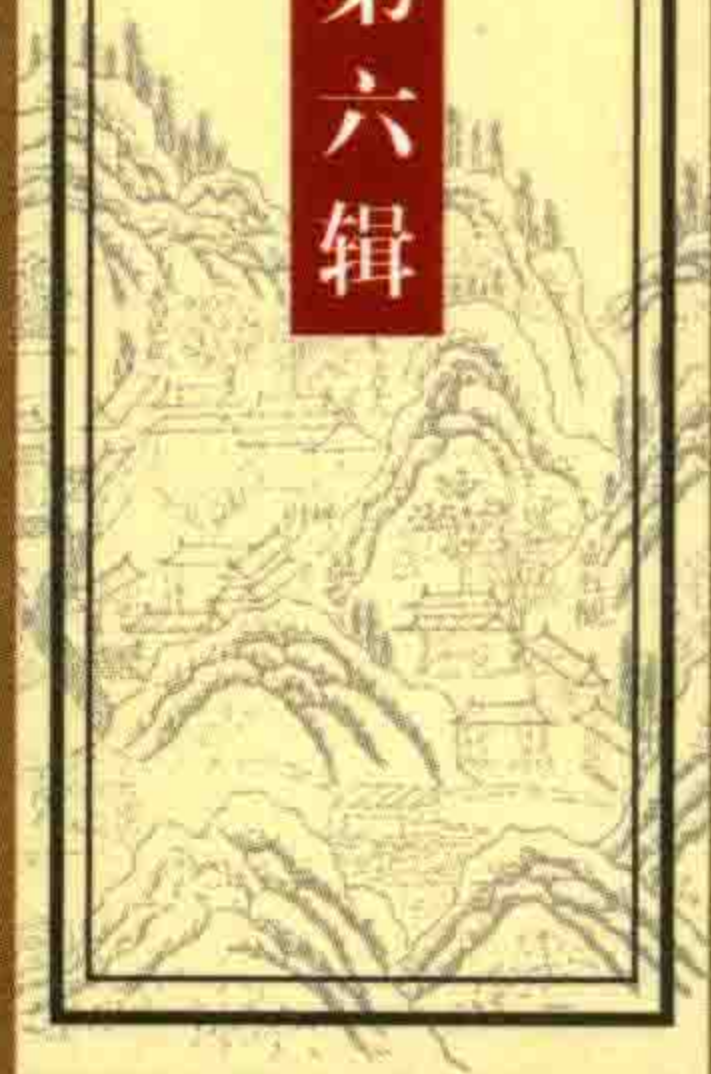


国学论衡

第六辑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主办

王晓兴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 主办

国学论衡

(第六辑)

王晓兴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论衡. 第六辑 / 王晓兴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097 - 9770 - 9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国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Z126.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251 号

国学论衡 (第六辑)

主 编 / 王晓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70 - 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国学论衡》学术集刊要出第六辑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是本辑的主编，大家希望我写序，这本是我的责任，但却感到有些为难。一是因为我确实不擅长做序题跋这一类的事，二是因为集子中已经收了我和易志刚的一篇文章，要说的话似乎已经说了，再来写序该说点什么好呢？但既然是责任，我就应该认真对待，努力说几句有意义的话，才不辜负大家的心意，也才对得起集子中的其他作者和集子的读者们。

顾名思义，我们的研究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呢？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弘扬传统文化。所谓传统文化，无非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们世代相传而延续下来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并不在人们的生活之外，而就在人们当下的生活之中，因此是不需要弘扬的。一种传统，如果需要弘扬，一是因为它已经消亡，已经从人们当下的生活中隐退；二是因为它本身是好的，是值得恢复的。可是，一种本身是好的传统为什么会消亡呢？或者反过来说，为什么一种已经消亡了的传统会被人们认为是好的，是应该恢复的呢？

拿这个问题来检讨中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关键的历史时期，都有人在做一件相同的事情：弘扬传统。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孟及其所代表的儒家企图恢复正在消亡的西周封建制；在秦汉建立郡县制大一统帝国后，有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们致力于恢复孔子及其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在看到了汉唐两朝帝国都消亡于一个剧烈的动荡和分裂时期（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历史现象后，有两宋文人或士大夫作为一个阶层或整体主

张回向“三代”的政治和学术努力；民元革命后，有军阀政客的“尊孔读经”，也有新儒家学者试图从宋学中寻找中华脊梁的苦苦追索；一直到今天，当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文化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祭出了“弘扬传统”这杆大旗。那么，每当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值得重新找回来的东西呢？

我们是中国人。正如西方人把古希腊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一样，我们中国人把“三代”视为自己的根。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成长起来，在冰河时期结束后的自然环境下，借助于“新石器革命”的成果一天天走向文明，并在创造文明的努力中终于达到人的精神自觉。这个精神自觉，在古代中国正是经由“三代”而达到的，它的成果就是西周的封建社会及其典章制度。正唯如此，当西周封建制全面走向崩溃的时候，孔子就站出来要恢复这个正在消亡的传统。孔子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但孔子却把古代中国人最初所达到的精神自觉凝结成为他的仁的哲学，并通过他的毕生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承载这种精神自觉的文化元典——“六经”。对于我们而言，“六经”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作为人的行为、思想和意愿的原始记载，因此蕴含着我们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就是我们的根。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孔子和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虽然没能挽救西周封建制的衰亡，也没能阻挡新兴的郡县制的成长，但却给后世帝王画上了一道底线：即使不能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王，但也绝不能成为像桀纣那样的暴君。不做桀纣之君，成为悬在历代帝王头上的一把利剑。正因为此，虽然汉承秦制建立了郡县制大一统帝国，但却不得不直面秦的骤兴和遽亡而进行检讨和反思。结果，自以为开创了千秋帝业而企望名垂青史的秦始皇，却因为“仁心不施”而落下了一个千古恶名，是为“暴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董仲舒的复兴儒家、独尊儒术的学术和思想运动。这个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的形成。

不做暴秦，成为自汉以降两千余年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信念。然而，这终于也只是一个信念而已。

宋是直接从五代十国的混乱状态中走出来的，五代十国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三纲五常之道绝”的局面犹历历在目，并为有宋一代文人或士大夫所深恶痛绝。而检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人们几乎把矛头一致指向汉唐，认为汉从一开始就是“袭秦之余”而背离了

“三代”传统。在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中，这个传统被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虽然打着“天理”的旗号，但却依然不能保证回向“三代”的政治实践的成功，有宋一代的几次变法最终都以失败而收场。政治实践领域的失败，使回向“三代”或恢复“三代”传统的努力不得不退回个人的领域，演变成为一种以提高个人道德品格或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修为或涵养。可是，当文人们日益沉浸于他们个人的修为之中，自娱自乐“玩索”起他们的涵养的时候，那个高高在上的“天理”就死掉了，而所谓“三代”传统也就离他们越来越远。

中国人的根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清王朝都是中国人被异族征服和奴役的时代。清初的学人中，有不甘心被奴役而不与征服者合作的所谓“遗老”，但真正能够坚持的也就那么几位，一则是因为学问确实够大，二则是顶上了一个“遗老”的声名。至于到晚年，默许自己的子孙低头认新主，则也算不上什么了。

其实，真正为那个时代学人代表的，应该是考据大师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1636~1704）和毛奇龄（字大可，晚年称西河先生，1623~1716）。

阎若璩最力之作是《尚书古文疏证》，历来被认为是清代学术的一大成就。问题在于：第一，阎若璩的证伪《古文尚书》，虽然凸显他的学术功力，但其动机却是向异族主子邀功请赏；第二，正因为此，他一边煞有介事、不无炫耀甚至不无戏谑地使用本证、旁证、实证、虚证、理证等考据手段，一边却在行文中近乎恶作剧地作伪、造假，玩天下学人于股掌。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27岁，始醉心于功名，但数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康熙十七年（1678），阎若璩43岁，应荐赴试博学鸿儒科落第，后参加徐乾学《清一统志》书局。康熙三十三年（1694），徐乾学去世，参与书局的学人云散，年近六旬的阎若璩归寓淮安。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时，阎若璩先后两次进献颂诗，希望亲聆圣谕，但却未能如愿。康熙嗣后，皇四子胤禛以手书相邀，年近古稀的阎若璩带病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受邀赴京，被胤禛尊为上宾。不久，阎若璩病情加重，胤禛请御医为他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逝于京师。

毛奇龄一度为抗清斗士，曾亡命江湖十余年。后靠朋友帮助，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已年过半百，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毛奇龄将其所做《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呈进南

巡的康熙皇帝，特蒙宣谕奖掖，得以颁行。毛奇龄猜度清廷会欢迎对代表中华文化正统的朱学的否定批判，因而做《四书改错》，其意是伺机邀宠。但没想到清廷改变文化策略，让朱熹配享孔庙。毛奇龄闻讯，竟亲手用斧子毁了《四书改错》的雕版。据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记叙：“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鲒埼亭集外编》）

学人已然如此，大众的面貌更无二致，其典型的形象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近三百年的异族征服和奴役，几乎斩断了中国人的根，从而完成了自秦汉以来一直进行的帝国臣民的塑造，形成了一种奇特而扭曲、被称之为“中国国民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既有专横骄奢的君主，也有无耻的贪官污吏；既有驯服的良民百姓，也有桀骜的刁民暴民；既有残忍的加害者，也有无辜的受害者。民元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每当人们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依然必须面对这个传统。

很显然，上面说到的这个传统不是我们要弘扬的对象。我们之所以主张“弘扬传统文化”，恰恰是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个传统的时候感到了缺失，需要重新找回那缺失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根，是可以称之为中华脊梁的、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个最初的精神自觉中所蕴含的做人的底线。深入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母体中，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支撑我们挺立于天地之间的脊梁，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面向未来、走向未来。

这是艰巨的文化工作，需要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青一代的学者投入他们的热情和精力。所喜的是，集刊本辑的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努力，才是中国文化的希望。

王晓兴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会长

2016年5月20日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晓兴

副 主 编 王金生 梁一仁 朱 林 马东军
陈声柏 成兆文

执 行 主 编 陈声柏

学术委员会 牛龙菲（陇菲） 颜华东 范 鹏
陈文江 陈春文

目 录

序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王晓兴 / I
论《国语》的成书和性质	邱 锋 / 1
开放文本视角下的《国语》问题综论 ——作者、年代与成书性质	张永路 / 88
“仁”何以可能 ——孔子再认识	易志刚 王晓兴 / 121
孔子忠恕思想考论	骆 扬 / 139
“汉得天统”：两汉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理性思考	靳 宝 / 168
《史》《汉》之间的史学发展	杜永梅 / 180
唐代学官的社会贡献	董坤玉 / 205
近代法治先贤黄远生宪法学说初探	李道刚 / 224
老庄之“道”与古希腊自然法的“同”和“异”	冯国泉 / 243
言性命必究于史 ——吕祖谦《东莱博议》散论	邱 锋 / 261

可观之想与想之可观

——读《锺吕丹道经典译解》之后感 孔 敏 / 271

编后语..... / 275

《国学论衡》稿约 / 279

论《国语》的成书和性质

邱 锋*

摘要 本文通过对《国语》及其他相关文献的研究，考证其成书及其性质问题。关于《国语》的成书，本文认为，《国语》由多种史料汇编而成，不可尽归于一时、一地、一人。全书诸篇依体例不同可分为《周语》《鲁语》《晋语》《楚语》之“正体”部分和《齐语》《郑语》《吴语》《越语》之“变体”部分。“正体”篇章多出自《语》书，与《左传》的相关记载来源于同一类材料；“变体”部分则与《左传》内容不相涉及，或未被《左传》作者所见，或较《左传》晚出，有些地方更接近于诸子学说。《国语》最终成书当晚于《左传》，编纂完成时间不会早于战国后期。关于《国语》的性质，本文认为，《国语》既不是解经的作品，也不是简单的语录汇编，而是汇集了历史上兴衰成败的典故和众多人物的言谈话语，通过它们用来总结教训，提供借鉴。其重点不在于撰述完整的历史，而是通过一些有选择的记述，叙述成败，以为鉴戒。

关键词 《国语》 成书 性质 《左传》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在中国传统史学和经学当中有一定的影响。该书本为周王室及诸侯国史料的汇编，自西汉以降，人们又视其为《春秋经》的“外传”，而称《春秋外传》^①，近代以来，更有学者从

* 邱锋，1976 出生，男，山东青岛人，历史学博士，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经学史及艺术史方面的研究。

① 如唐代史家刘知幾曾把它誉为“《六经》之流，《三传》之亚”（刘知幾《史通·六家》）。

史学史的角度，阐发其学术意义^①。所以无论就史料价值还是编撰方式而言，该书在中国古代的典籍当中都具有独特的性格与价值。不过围绕《国语》的成书、作者以及性质问题，自古以来也饱受争议、众说纷纭。今不揣简陋，蒐集诸史材料，并引前贤之论，对其成书过程和性质问题略做探析，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国语》同左丘明的关系

关于《国语》的作者，最早见诸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段文字又大致见于他的《报任少卿书》：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②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按照史迁的说法，《国语》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左丘明的人。关于这个左丘

① 如梁启超把它和《世本》并称为“史学界最初有组织之名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3页）；白寿彝也将其与《左传》同列为“《春秋经》以后关于春秋史的重要私人撰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25页）。

② 引自中华书局点校本《汉书》卷62《司马迁传》，《文选》所收《报任少卿书》无“明”字，《汉书》亦有无“明”字的版本，详见下文。

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还有记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可见，这个左丘明是鲁国的君子，他不但著有一部《国语》，在孔子死后，由于害怕孔门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又根据孔子传下来的史记写成了一部《左氏春秋》。

在司马迁之后，班彪也提出：

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①

其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里亦云：

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同时《汉书·艺文志》也列有：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与司马迁不同的是，班氏父子明言《国语》成于《左传》之后，而在《汉志》中左丘明的身份则由鲁君子变成了鲁太史。此外《汉志》还提到他大约是孔子同时的人物，曾与孔子一同观史：

^① 范晔：《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除马、班外，王充在《论衡》中也提出：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之。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①

可见汉儒们在《国语》作者是左丘明这一问题上并无异议。此后的学者如韦昭、孔晁、刘知幾、司马光、晁公武、李焘等人大都持与此相同或相近的观点^②，《国语》为左丘明所做遂成为一种最为普遍的看法。

不过，自魏晋以降，也有不少学者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现就其中具代表性的观点，条列于下，以便讨论：

1. 傅玄：《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③

2. 刘炫：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刘炫以为《国语》非丘明所作，为有此类往往与《左传》不同故也。”^④

3. 赵匡：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穀，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过人，岂宜若此！推类而言，皆孔门后之门人，但公、穀守经，左氏通史，故其体异耳。且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焚书之后莫得详知，

① 王充：《论衡·案书》。

② 参见朱彝尊《经义考》卷209，中华书局，1998。

③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第2171页。

④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2页。

学者各信胸臆，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丘明为其人。此事既无明文，唯司马迁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且迁书好奇多谬，故其书多为淮南所驳；刘歆则以私意所好，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自古岂止有一丘明姓左乎？何乃见题左氏，悉称丘明？^①

4. 柳宗元：《越》之下卷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②

5. 叶梦得：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③

6. 郑樵：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之后，丘明犹能著书。^④

7. 崔适：《国语》文辞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作为也。^⑤

8. 孙海波：《齐语》全同《管子》小匡，亦与他语不类，盖是抄取《管子》者。按《管子》一书，非管仲作。乃西汉好事者辑录成之，故其中多有汉人之文。而《小匡》以篇，吾友罗雨亭先生定为汉初人作。今《国语》反录自《管子》，其成书之晚可知。^⑥

9. 洪业：其引姜氏之言曰：“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飡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韦昭注曰：“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故云未半。”今自文公后数之，至静公二年三家灭晋 B. C. 425，得十七世。合得三十以世，瞽史之言验也。（自注：叶按惠以上，殆沿曲沃一支以达唐叔。惠、文之间，怀仅数月，且为文从子，殆不计也。）^⑦

10. 杨伯峻：若说《郑语》成书在前，不及见齐桓公、晋文公更不及见子产。若今《郑语》“半姓夔、越，不足命也”，“闽半蛮矣”

① 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第一册，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10页。

② 柳宗元：《非国语》，见《柳宗元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8，第1328页。

③ 朱彝尊：《经义考》卷209。

④ 郑樵：《六艺奥论》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崔适：《崔东壁遗书·洙泗考信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395页。

⑥ 孙海波：《〈国语〉真伪考》，《燕京学报》1934年第16期。

⑦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见氏著《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第274页。

（原作“蛮半蛮矣”，今从汪远孙《国语发正》据《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引文订正），足以证明《郑语》作者看见楚威王伐越，杀王无彊，而越以此散（详《史记·越世家》）诸事。楚威王灭越，在公元前三二九年，则《郑语》作于这年以后。尤其是《郑语》又说：“曹姓邹、莒，皆在采卫。”《汉书·韦贤传》说：“韦贤，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作谏诗曰：‘王赧听谮，实绝我邦。’”这么，邹国实在王赧时被灭……王赧即位于公元前三一四年，则《郑语》之作，又在此后。^①

这些说法虽然各异其趣，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四类。

第一，《国语》对一些史事的记载和《左传》有所出入，所以并非是左丘明所作。（傅玄、刘炫）

第二，《史记》所说“厥有《国语》”的丘明不是左丘明。（赵匡、叶梦得）

第三，《国语》各《语》间文风有别，不是一人所作。（柳宗元、崔适）

第四，《国语》中有些内容涉及一些较晚的史实，不可能为左丘明所见。（郑樵、孙海波、洪业、杨伯峻）

这四类观点，看似均言之在理，但细加思索，亦不无偏颇之处，使得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越显纷乱芜杂。如能对其一一梳理辨析，则对澄清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大有裨益。

第一类观点（傅玄、刘炫），究其源流实出自郑玄。《国语》《左传》对于晋、吴“黄池之会”记述有所不同，《国语·吴语》记载吴为盟主，《左传》则记晋为盟主。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哀公十三年》“乃先晋人”句下《疏》引：

郑玄云：“不可以《国语》乱周公所定法。”^②

《左传》源自三晋，记载上自然对晋国有所回护，“黄池之会”谁为盟主，似应以《吴语》和《公羊传》的记载为准^③。郑玄全信《左传》而贬斥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见氏著《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90，第44页。

②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71页。

③ 参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左》《国》异同”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78页。

《国语》，自不足据。傅玄（见材料1）、刘炫（见材料2）凭借《国语》《左传》之违异，判定《国语》非左丘明所作，论证亦非有力。因为即便是在同部书中，记载上的矛盾也时有出现，以《史记》为例，《本纪》《世家》《表》记载之相互乖违矛盾又何止一处。所以，仅凭二书记述的差异，实不足证明它们非一人所作。相对于左丘明作《国语》的传统说法，傅玄、刘炫的异辞在当时未能产生影响，就连引用他们观点的孔颖达对其也难置可否，只是说：“先贤或以为《国语》非丘明所作，为其或有与《传》不同故也。”^① 态度两可。

第二类观点（赵匡、叶梦得）始于中唐，盖与其时学风变古，学者多具怀疑精神有关。《论语·公冶长》载：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赵匡根据这条记载，认为既然夫子拿左丘明来自比，左丘明就应当是孔子之前的一位圣贤了。为说明这点，他又列举孔子自比于老彭和称颂伯夷等人的例子以为旁证（见材料3）。根据《史记》《汉书》和《严氏春秋》引《观周篇》^② 的记载，左丘明应为孔子同时人，或比孔子年少，曾亲见夫子。赵匡的观点，置这些记载于不顾，全是出于自己的臆想。一部《论语》中孔子称赞或自比他人的地方很多，并非全是赵匡所谓的“非同时人也”。如同在《公冶长》篇中另有孔子的一段话：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20页。又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二十六年》“栾、范易行以诱之”句下《疏》：“此与《楚语》俱述声子之言，《传》言鄢陵之败苗贲皇之为，《楚语》亦论鄢陵之役，而云雍子之为，二文不同，或丘明传闻两说，两记之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92页）可见孔颖达亦倾向于《国语》为左丘明所作的说法。

②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句下《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05页）